

# 苏南模式与人口转变

刘洪光

苏南地区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3市及所辖的12个县(包括6个县级市)。这一地区以其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综合发展的“苏南模式”而引起中外瞩目;人口发展也因进入了“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同样引起普遍关注。它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出生率,同全国的出生率在降至20%左右出现连续回升、波动<sup>①</sup>形成鲜明对照。更具意义的是,这一人口转变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的,由此呈现的先导性和人口转变经验,显示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口转变的概念引自于欧美。中国的人口转变被视为异于传统经验模式而独具特征。其转变经验历程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经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过渡,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sup>②</sup>;也有细分为五阶段的,即加速增长阶段、特殊阶段、匀速增长阶段、减速增长阶段、波动增长阶段,并把除特殊阶段以外的四个阶段定义为中国人人口转变模式<sup>③</sup>。

苏南地区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第一个转变及所表现出的人口特征同全国比较具有相同的历程。其根本特征都是在出生率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源于制度性因素所带来的社会安定、经济复苏,尤其是群众性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推广和普及,死亡率开始急剧下降,并在较短时间内(不到10年)降至10.7%(1957年)。由此,带来了人口的加速增长阶段,或称过渡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高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并达到较低水平(1965年降至7.9%)。

表 1 部分年份苏南地区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 (%)

年份	1949*	1954	1957	1962	1966	1972	1977	1980	1981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出生率	39.2	37.8	39.3	33.0	29.1	18.9	14.8	13.4	17.1	15.2	7.8	14.1	15.2	15.0
死亡率	16.4	10.8	10.7	10.8	7.1	6.3	6.7	6.9	6.7	6.2	6.5	6.5	6.8	6.6

\* 常州市数字。引自《常州发展四十年》第100页。

资料来源:根据江苏省历年人口统计资料整理计算。

苏南地区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第二个转变及所表现出的人口特征为,死亡率维持在低水平(6—7%)几乎不变,出生率开始由较高水平(30%以上)持续下降。比较全国,苏南生育率转变后的人口过程呈现出自己的特征(表1,图1)。

第一,苏南出生率由30%以上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始于1965年,经过了7年,到1972年已降至20%以下的低水平。全国的出生率下降开始于1971年,1971年的出生率为30.7%,经

①参阅朱国宏:“现代化与中国人口”,载《人口研究》1989年第2期。

②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107页。

③参阅朱国宏:“人口转变论:中国模式的描述和比较”,载《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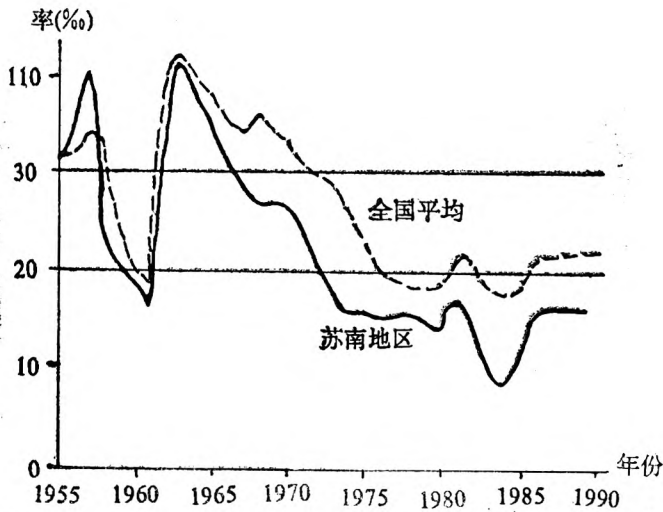


图1 苏南地区与全国平均出生率下降情况比较

第三,苏南出生率仅有的一次回升是在1981年(出生率为17.1%),表现为育龄妇女一孩生育的“迭加”,其生育水平并未上升。全国1981年人口回升则是生育水平的回升<sup>①</sup>。而始于1986年的全国人口出生率的回升在苏南并未出现。

如上所述,尽管苏南与全国同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但推进速度和完成程度则不同。这里,使用总和生育率、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 $e^0$ 、城市化比例等参数,可以做一对比衡量(见表2)。

表 2 亚太地区国家或地区人口转换指数

国家或地区	人口转换指数	国家或地区	人口转换指数
日本	1.00	中国	0.75
香港	0.98	中国上海	0.97
新加坡	0.95	中国江苏	0.79
中国台湾	0.85	中国苏南地区	0.82
南朝鲜	0.80		

注:人口转换指数= $0.40[(7.5-TFR)/5.3]+0.40[1-(75-e^0)/43]+0.20[u]$ ;式中TFR=总和生育率, $e^0$ =出生时预期寿命; $u$ =城市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①[日]黑田俊夫:“亚太地区的人口多维性与日本的关系”,载《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3期。

②中国及各地区指数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80年代初,苏南人口转换指数为0.82,明显高于全国,相当于南朝鲜和我国台湾省的水平<sup>②</sup>,达到了接近人口转换最终阶段的指数。到了90年代初,苏南人口转换指数上升至0.90—

①参阅马瀛通:“1986年与1981年的两次人口回升比较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5期。

②南朝鲜TFR=2.1(1986年), $e^0=62.7$ (男),69.1(女)(1978—1979年), $u=61\%$ (1982年),中国苏南地区(1982年);TFR=1.8, $e^0=69.37$ (苏州市), $u=22\%$ ,差异仅在城市人口比重上。

0.95, 接近完成的水平。1986—1990年, 苏南人口出生率年均15.5%, 自然增长率在1%以内, 人口再生产在更替水平以下, 已经达到社会生产力发达的先进国家的低水平。

## 二

苏南的人口转变始于70年代初。而70年代的苏南, 地区经济并未实现高速增长。197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400元左右, 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 引人注目的是, 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 率全国之先, 以农业积累为基础的社队企业的兴旺和以社队企业为标志的经济体制的转变, 却在悄悄地“起步”, 并孕育着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的雏型<sup>①</sup>。1970—1978年, 苏南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7%, 其中工业产值达到13.3%, 社队企业的产值年递增率更是高达36.4%。以无锡县为例, 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总收入1970—1979年增长1.6倍, 年均增长17.2%。止1978年, 苏南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74亿元, 工农业总产值167亿元(其中工业占80.5%); 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占有量达到643元, 人均占有粮食536公斤。这是其他农村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以及农村经济从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传统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向以机器化生产为主的现代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转变, 为人口转变创造了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而始于70年代初, 城乡各地普遍开展的计划生育则起到促使人口转变“助推器”的作用。当时提出的“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一方面因得到政治上组织上的保障而显得卓有成效, 另一方面也因符合群众利益愿望而被普遍接受并得到积极响应。两者结合加速了出生率的下降。

进入80年代, 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战略模式的转变(政策因素), 苏南地区在原有基础上, 实现了经济“起飞”, 并形成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苏南模式”。由此, 进入了人均产值增长和结构变化加速增长(即高速增长阶段),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 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90年, 苏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527元, 是全国平均的1.3倍。就增长而言, 1980—1990年, 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7.0%, 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在1990年全年创造的396亿元国民收入中, 工业份额已经占到66.2%。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及所处的阶段, 苏南已大大领先于全国。农村地区尤甚。

需强调的是, 苏南在发展农村工业的同时, 以工补农, 以工建农, 农业和副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强化和发展, 并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1990年, 12个县(市)农副工产值达到777亿元, 人均占有粮食559公斤, 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1457元(未加权), 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471万瓩。这种以工业为支柱产业, 全面发展的趋势, 在中国是少有的。

80年代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主体为“两提倡”, 即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从实际执行看, 苏南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且实效性大大优于全国其他地区。1980—1990年, 苏南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0.90%(1986—1990年为1.14%), 全国达到1.48%(1986—1990年1.98%)。这种差异的形成在于人口政策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

由上可见, 苏南地区70年代以生育率下降为标志的人口转变呈现时间短、速度快的特点, 且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 主要归结于适应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人口政策因素的决定作用。80年代, 生育政策富有成效, 促使人口转变稳定地趋于完成, 则又在于经济发展的密切

<sup>①</sup>参阅顾松年等著:《苏南模式研究》, 南京出版社, 1990年版。

配合，即苏南地区基本具备了人口转变走向完成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

### 三

就全国范围而言，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可以说，人口转变完成的进程被大大延缓了。表现为出生率的连续回升、波动。被解释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现代化基础”<sup>①</sup>，“现实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中国人口，甚至于中国经济不能稳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②</sup>。归结之，源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和广大农民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工业现代化之外所造成的痼疾之积重难返。

从已完成人口转变的经济发达国家看，无论是欧洲模式抑或日本模式，它们都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而完成了这一过程。欧洲生育率转变发生在产业革命完成以后（19世纪中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自发的过程，被视为现代化的产物。如英国，农业劳动力占在职经济活动人口由1851年的21.5%，降至1937年的4.1%，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大致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到1911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76%<sup>③</sup>。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生率下降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20世纪50年代），是经济“起飞”和政府倡议的节制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在完成人口转变的同期，由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变成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1950年48.3%，1965年24.6%，1975年至降12.7%；相应地，城市人口比重由1940年的35%增至1975年的76%<sup>④</sup>。

反观我国，农业人口仍占绝大多数（1989年为78.9%）。苏南地区也不例外。1982年苏南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1.6%，1990年也仅有28.1%<sup>⑤</sup>。非农业人口大致也维持这样一个比例。从经济发展看，地区工业化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的。这表明苏南人口转变的经济环境有别于世界发达国家，不可能在高度的城市化中完成。

那么，为什么城市人口比重较低的苏南地区在生育率转变后能够实现人口的稳定发展呢？笔者认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构成了苏南人口转变渐次完成的契机。

乡镇企业是苏南经济发展模式的着力点和苏南农村现代化模式的支撑点。它在地区发展中的贡献被表述为：①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②找到了农村工业化的有效途径，确立了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③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新路子<sup>⑥</sup>。这种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城乡一体化的态势影响深远，波及到社会的整体，引起了经济与生育之间一系列中间因素的转变（见15页图2）。

首先，促进了农村生活方式的社会化。过去那种以手工工具为主，建立在自给半自给经济基础上的小农生活方式，已被以现代化机器生产方式为主，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表现在：①劳动生活方式上，绝大多数农民已摆脱了繁重的田间体力劳动。目前在苏南农村，工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工业劳动者已经取代农业劳动者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职业。②消费生活方式上，正由落后的消费方式和结构转向现代消费方式和

①见第11页注①。

②程燕立：“试论经济结构与人口转变”，载《人口研究》1991年第4期。

③④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302页及第209、211页。

⑤全国人口普查手工汇总数据。

⑥“苏南模式和社会进步”课题组：“完善苏南模式，推进社会进步”，载《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91页。

表 3

苏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

年份	人均 GNP (元)	GNP 部门构成 (%)			就业者部门构成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643	22.0	61.9	16.1	60.0	28.9	11.1
1980	834	19.5	63.9	16.6	55.6	33.5	10.9
1985	1800	17.7	64.7	17.6	34.0	49.6	16.4
1990	3527	15.3	63.1	21.6	28.9	52.2	18.9

资料来源：“江苏四十年”，《江苏统计年鉴》（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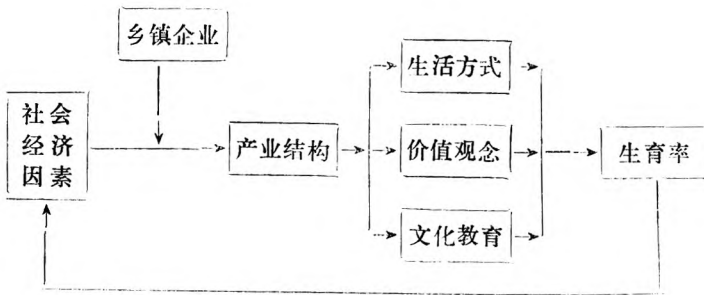


图 2 农村现代化与生育率关系示意图

结构。以苏州市为例，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1988年年均纯收入已超千元），饮食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已降至50%以下（1988年为41.1%）。而农村家庭收入1000元、恩格尔系数小于50%被认为是生育率转变的临界值<sup>①</sup>。③闲暇生活方式上，过去那种“日落而息”的单调、落后的闲暇方式

在苏南农村再已看不到了，以文化、娱乐为主的都市型闲暇方式正在苏南农村普遍化。

其次，价值观念的更新。这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心理反映。在苏南，农民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和小农经济意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更多地注重价值比较，并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男女平等观和少生优生观（家庭可以从减少生育中获得好处），且这种生育观正逐步社会化。

最后，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苏南因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市、县已基本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虽然整体上人口文化程度结构仍呈正金字塔形，但基本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1990年，6岁及以上人口文化程度结构比为：大学2.1%，高中（含中专）11.6%，初中33.4%，小学36.2%，不识字和识字很少16.7%，文盲率（15岁及以上）18.3%，且多数集中在老年人口中<sup>②</sup>。文化结构由初等趋向中等水平。而对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等教育对生育率下降起到重要的作用<sup>③</sup>。

上述变化，着力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又对生育施予直接影响。发达的乡镇企业吸收、消化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消除了二元经济结构。由此推动的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和现代化，使产值的增加、收入的提高由过去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转向质量上，且也提高了孩子的抚养成本。同时，农业工业化及由此带来的农村城镇化，又使农村生活方式逐步城市化、现代化。农民在满足物质需要外，越来越注重文化、娱乐等精神上的丰富和提高，并由此而促使人

①参阅张纯元：“论人口消费结构”，见第五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1990年。

②见第14页注⑤。

③参阅何林、袁建华：“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载《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4期。

们生育观念上转变为少生孩子。此外，苏南模式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独生子女有所奖，新生幼儿有所育，老年人口有所养，也弱化了人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人们更加注重优生优育。

可以说，苏南地区已基本具备了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基础。而计划生育则从政策上起到“加速器”的作用，即促使人口转变尽快地趋于完成。苏南人口控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对生育的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并实现了计划生育工作良性循环的网络体系。从政策执行看，苏南模式中农村集体化道路的特征以及县乡两级组织是实际决策者的特征<sup>①</sup>对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积极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全国农村经济管理事务的家庭化，且与生育管理相互分离、相互矛盾的现象，在苏南农村，却因农村集体经济的主导性得以有效弥合、消除。另一方面，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也得到了组织制度的保证。这是基于县乡两级的党政领导者，是发展乡村工业和地区经济的实际决策人，对整个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决策权。经济管理和人口管理有效地统一于行政领导之下。

同时，这一转变也反映了苏南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强烈的人口意识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开创了 中国 独特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同样地，他们也在努力实践着人口与经济相互协调运行的良性轨迹，探求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

#### 四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1. 苏南人口转变既属于中国模式，又具有自己的特征。出生率的下降不仅速度快、幅度大，且在低水平上呈相对稳定。苏南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欧洲国家用一百多年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可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2. 苏南人口转变历程同苏南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齐头并进。人口转变的起始恰是苏南模式的“胚胎”和雏形孕育期，而人口转变的渐趋完成则是苏南模式的成形和发育成长期。到将来，随着苏南模式的改革和完善，人口转变必将完成全过程，并表现出超前势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南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人口发展模式。它提供了这样一种范例，即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国家和地区如何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实现对人口结构的调整。

3. 同日本模式相似，苏南人口转变始于经济高速增长之前，政府的人口政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而人口转变稳定地经历最后阶段并趋向完成，则是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紧密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是，日本的人口转变同高度的城市工业化相联系，而苏南的人口转变则伴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实现。这正是苏南人口转变区别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所在。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

<sup>①</sup>朱通华，“中国‘苏南模式’与日本‘大分模式’的研究”，载费孝通、鹤见和子等著《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09页。